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讲话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辅导材料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编 者 的 话

为了学习和宣传贯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由中共广西党校和中共广西区直机关党委联合举办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辅导班，聘请广西党校教研室的胡隆镁、潘大荣、薛家凯、苏毅之、廖慧、叶裕惠、张敦、梁天明、林卓才、周静芳等十位同志，按《决定》的十个问题进行讲授，全部讲课提纲谭纪同志作了校改，印成活页本发给学员。现把讲课提纲编印成册，取名《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讲话》，内部发行，供教学参考。由于时间仓促，我们的理论和政策水平所限，本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第一讲 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胡隆镁 (1)
- 第二讲 改革是为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潘大荣 (17)
- 第三讲 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薛家凯 (34)
- 第四讲 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苏毅之 (52)
- 第五讲 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廖 慧 (67)
- 第六讲 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叶裕惠 (86)
- 第七讲 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张 敦 (106)
- 第八讲 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梁天明 (124)
- 第九讲 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林卓才 (147)
- 第十讲 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周静芳 (165)

第一讲 改革是当前我国形势发展的 迫切需要

胡 隆 镁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光辉范例。《决定》深刻地总结了三十多年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正确地回答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纲领。

《决定》第一部分，主要是阐明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学习这一部分，要着重弄清三个问题：一、认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前进的，从而了解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不断改革的思想；二、认识加快改革是我国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树立改革的紧迫感；三、认识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从而坚定实现改革的信心。

下面就这三个问题谈谈自己学习的初步体会。

一、社会主义社会是在改革中前进的

所谓改革，就是新陈代谢，就是破旧创新。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不断变革的历史。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凝固的不变的社会，而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社会。恩格斯早就预言：“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恩全集》第37卷第443页）

为什么人类社会不断发生变革呢？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呢？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指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的需要；凡是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合经济基础需要的上层建筑，迟早都得改变；不改变，就要阻碍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前进。正是由于这种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才使社会发生变革，推动社会前进。这是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

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基本原理运用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种基本矛盾的存在和运动，是改革的深刻的内在根源。我们改革经济体制，从一般意义来讲，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经济体制是经济关系，也

就是生产关系，因为它包括管理，所以也涉及上层建筑。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整个说来是先进的，是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的。但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制度和具体环节上，还存在着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决定》指出，我国经济体制存在着“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等弊端。这些弊端，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反映。不解决这些矛盾，不克服这些弊端，就会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这种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同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经济还比较落后，生产力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还是低的。我们取得的成就，同人民付出的巨大努力很不相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历史上我国经济文化非常落后这个客观条件之外，在主观上说，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长期没有把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二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上犯了“左”倾错误，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使经济建设发生了几次折腾；三是长期没有克服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企业缺乏活力，缺乏生机，把经济搞死了。这三个问题，都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反应，都妨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前面两个问题，已经解决或者基本解决了，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并且显得更加突出了。

怎样解决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呢？经济体制反映的是社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它同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激烈的阶级对抗，不可能由剥削制度本身解决。剥削阶级虽然也可以通过政治、经济的手段，调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个别环节，使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略有改善，以缓解阶级矛盾，保持社会的暂时稳定。但是，他们不可能对社会实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改革，因为这种改革不利于剥削阶级。因此，阶级社会里的基本矛盾，最终总是由代表新的生产力的阶级，通过革命，改变旧的上层建筑，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则不一样，它不表现为对抗，不是依靠激烈的阶级斗争来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是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克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制度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这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方法就是改革，通过改革，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使之与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协调发展。由此可见，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和改革是不可分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不断前进的。胡耀邦同志说：“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改革要贯穿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这应该成为我党领导四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想。”又说：“在新时期，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同志中确立社会主义社会还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这样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作出了改革的决策，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系列重大的政策和措施，有领导有步骤地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几年农村经济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革农业经营方式，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方式，由过分集中统一的经营，改变为集体统一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克服了生产上的瞎指挥、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病，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二是调整 and 改革农村的产业结构，纠正过去单一抓粮食生产、忽视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倾向，使我国农业得到全面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发展很快，我国农村经济正在逐步走上农工商综合经营、协调发展的道路。三是改革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实行政社分设，使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这几项重大改革的成功，使我国农业发展充满活力，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国粮食总产量，一九五八年四千亿斤，一九七八年六千亿斤，年总产增加

28210

二千亿斤，花了整整二十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六千亿斤增加到八千亿斤，只用了六年时间。棉花生产的情况也是这样。一九五八年全国棉花总产量接近四千万担，到一九七八年只增加到四千三百万担，二十年徘徊不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六年翻了一番多，预计今年可达一亿一千万担。现在，整个农村是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农村改革的成功，以雄辩的事实告诉人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先进的，优越的，只是因为经济体制有毛病，它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中国人不懒不笨，只是因为“吃大锅饭”，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一旦改革了不合理的体制，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社会主义制度将越来越显示它的无比优越性。

农村改革的成功，以社会实践的效果证明了改革的必要性，证实了社会主义在改革中前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目前我国城市经济体制中的弊端反映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通过改革克服弊端，解决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将大踏步地前进。

二、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的精神是要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的迫切愿望，加快改革的步伐，使改革由局部走向全面，由农村走向城市和整个经济领域。

为什么当前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呢？《决定》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第一，农村改革的发展迫切要求城市加快改革。

国民经济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城市和农村在经济上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农村改革的成功和形势的迅猛发展，给城市带来了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一方面，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and 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在进一步促进农村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迫切要求改革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城市经济体制。

经过这几年改革，我国农村出现了三个历史性的变化：一是整个农村正在由过去几千年来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向着比较大规模的商品经济转化。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七八年相比，全国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已由百分之三十五点六提高到百分之四十点五。全国已有专业户、重点户二千四百万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十三，专业产品的商品率达到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二是我国几千年来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技术落后的传统农业，正在向现代化农业转化。农民中重视学习和应用科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多，农业科研成果和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加快了。三是我国一部分地区和农民率先富裕起来。农民的生活消费，正在由几千年来自给性和半自给性的消费，转变为以商品性消费为主。据调查统计，一九八三年和一九七八年相比，在农民全部生活消费中，商品性消费（即用货币支付的消费）已由百分之三十九点七上升为百分之五十八点八，自给性消费则由百分之六十点三下降为百分之四十一.二。一些富裕农民开始讲究“吃要营养，穿要漂亮，住要宽敞，用要高档”，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农民家庭。这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已展现出农村生活的前景。

农村这三大变化，向城市提出了两项迫切的要求。一是疏通城乡流通的渠道，为日益增多的农副产品开拓市场，并向农村提供更多更好的生产资料和工业消费品；二是满足农民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但是，由于城市经济体制不合理，现在城乡流通渠道很不通畅，普遍存在着卖难买难的问题。农民卖粮食难、卖黄豆难、卖花生难、卖甘蔗难。买化肥难，买农药难，买柴油难，买各种生产资料都有困难。现行的教育体制、科技体制，也不利于为农村培养人才，不利于人才向农村流动。这种状况，同农业生产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发展的形势很不相适应，急需加以改革。如果城市仍然保持僵化的经济体制，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农民需要的工业品买不进来，农民对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严重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刚刚从农村不合理的经济体制下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又将被城市不合理的经济体制所束缚。农村改革的积极成果就不能巩固，更不能继续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必将严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城市已经处在农村改革包围之中。加快城市改革，使城乡改革同步进行，已是当务之急。

第二、加快改革是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决定》提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城市为重点。为什么要以城市改革为重点呢？除了上面说的城市改革落后于农村改革这个原因之外，还因为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决定》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

相对地说，城市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几，而全民所有制企业上缴国家税利却占全国税利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全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都是一定区域的交通枢纽，具有较方便的运输和储藏条件；社会的商品流通，城乡以及对外物资交流，都是以城市为集散地。城市又是人才比较集中的地方，具有科技优势，信息比较灵通。金融活动也主要靠城市来组织。所以，城市成为生产中心、交通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中心、信息中心。城市经济的这些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我们要以城市为中心来组织和管理国民经济，经济改革也应当以城市为重点。

我国发展城市经济的条件是十分优越的，而且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三十多年来，我国城市经济有很大发展，但并未取得应有的成就，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不高，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长期亏损。其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政治的、思想的原因之外，经济体制不合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国城市现行经济体制，主要存在三大弊端。一是政企职责不分，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没有什么自主权，不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合理使用自己的人力、财力、物力，有效地组织产供销活动，而是一切听命于国家。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资金由国家分配，物资由国家供应，产品由国家调拨。在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企业变成了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的附属物，而不是相对独立的经济实力。这就严重束缚了企业自主经营的积极性。二是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按行政系统（即所谓“条条”）、行政区划（即所谓“块块”）来组织和管理经济。生产指标由

条块分层下达，资金和物资按条块切割分配，商品流通按条块组织，基本建设项目按条块安排，国营企业也分别隶属于各个条条块块。这就形成“部门所有”和“地区所有”，在条条块块之间、城乡之间，好象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壁垒，人为地割断了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盲目生产、重复建设、流通堵塞、技术封锁等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我们的大而全、小而全，就是在这种体制下形成的。三是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企业捧着“铁饭碗”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捧着“铁饭碗”吃企业的“大锅饭”。这两种“大锅饭”，使企业内无刺激的动力，外无竞争的压力，企业缺乏积极性，职工也缺乏积极性。“大锅饭”是个大祸害，它不仅严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给工人阶级带来严重损害。工人阶级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主人翁的责任感，为社会主义建设献身的热情，正在一天一天地被“大锅饭”消磨着。

近几年来，对于城市经济体制中的这些弊端，也进行了许多改革的试验和探索，收到了很大的成效。城市经济生活，开始出现了多年未有的活跃局面。但是，正如《决定》所指出，城市的改革还是初步的，城市经济体制中严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还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只有坚决地系统地进行改革，才能使城市经济兴旺繁荣，才能适应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需要，才能使城市真正起到应有的主导作用。

第三，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改革更具有紧迫性。

近三十年来，世界上的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往

任何时期，出现了一批新技术。其中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型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等，集中体现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就。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或者几十年之内，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对于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国外有人把它称为“第三次浪潮”，也有人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则称之为新技术革命。

《决定》指出：“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新的机遇呢？因为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在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正好给我们提供了选择和采用最新技术成果的机会，提供了引进适用先进技术以加速我国技术改造的机会，还给了我们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营管理方法的机会。为什么说它又是一种挑战呢？因为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代表了最新的生产力，它对我国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提出了挑战，对我国的教育和科技领域提出了挑战，更严重的是对我国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

首先，我们的经济体制不利于引进新技术，不适应新兴产业的特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比较，有几个特点，一是技术变化快，二是设备更新快，三是质量要求高，四是市场竞争激烈，五是投资风险大。这些特点要求生产单位和科研单位，对外界的各种信息，要反映灵活，决策果断，行动迅速，要求有高效率、高水平的经济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而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却是高度集中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多层次的垂直领导关系，象座金字塔一样，企业处在“金字

塔”的最低层，要办一件事情，需要层层审批，效率很低，运转缓慢。这种体制不改变，我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错过利用最新技术的机会。

其次，我们的经济体制，不能使企业关心技术进步。因为企业缺乏自主权，企业经营的好坏同企业领导和职工没有多大利害关系，企业的产品不管是否符合社会需要，反正有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收购，所以企业就不关心技术进步。我们的许多政策，包括某些税收政策，奖励制度等等，也不利于刺激企业采用新技术。所以我们的科学技术也就不能很快形成强大的生产力。据统计，我国的科技成果，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不能很快推广应用。我们许多企业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就是经济体制这种弊病的突出表现。不改革这种管理体制，我们就很难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果，推动技术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

能不能加快城市改革的步伐，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形势，对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以至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一九八三年十月，赵紫阳总理召开座谈会，专门研究新技术革命和我国四化建设的关系。他指出，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时机利用得好，抓紧应用新的科技成果，发展我们自己的经济，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的差距缩小。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处理不当，或者漠然视之，那就会使我们同发达国家，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扩大，有可能把我们甩得更远。我们应当努力争取第一种可能，避免第二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国近代史上有过深刻的教训。十九世纪后半期，日本抓住当时的工业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明治维新，

很快发展起来了。我国由于清政府的腐败，错过了这个良机，中国和日本的差距越拉越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在六十、七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有长达十多年的经济繁荣。日本在这时期经济起飞了，亚洲、南美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起来了。而我们这个时候却正在经历十年浩劫，又坐失良机。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对新技术革命采取正确的对策，其中重要一条，就是要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跟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步伐，使我国经济早日起飞。

综上所述，为了巩固和发展农村改革的巨大成果，为了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为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都需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应当有改革的紧迫感。当然，全面改革是一项复杂艰巨的大工程，改革既要大胆、坚定，又要稳妥、扎实。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实现全面改革的任务。

三、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条件已经具备

《决定》充分表现了我们党立志改革的决心，敢于改革的勇气，夺取改革胜利的信心。这种决心、勇气和信心，不仅建立在客观需要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基础上的。《决定》从政治、经济、思想和领导经验四个方面，论述了实行全面改革的基本条件。

第一，我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益巩固，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创造了前提条件。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就作出了改革的决策，提出了改革的任务。当时全面拨乱反正刚刚开始，消除十年内乱严重后果的工作十分繁忙，我们党还不可能集中全力来抓全面改革。经过几年的努力，各种曾经分散领导精力的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大体上得到解决。一心一意搞四化，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总目标、总任务，这条政治路线已经为全党所接受，为全国人民所拥护。特别是通过去冬今春开始的全面整党，已经和正在端正各条战线现代化建设的业务指导思想，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党和人民可以集中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全面改革，并且不至于因改革引出什么大乱子。

第二，我国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为全面改革经济体制，准备了物质条件。在十年内乱中，我国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已经濒于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工农业生产虽然有所恢复，但由于急躁冒进，把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积累率太高，因而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更加严重。一九七九年初，党中央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主要是在农村进行。城市经济只能以调整为中心，相应地进行一些改革的试验和探索。经过几年的努力，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绩，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摆脱了重大比例失调的困境，出现了稳定增长、协调发展的新形势，第六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三，全面改革有广泛的深厚的群众基础、思想基础。